

ZHONGGUO RENWEN TIANYE

中国人文田野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封面人物：史念海先生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 国 人 文 田 野

中国人文田野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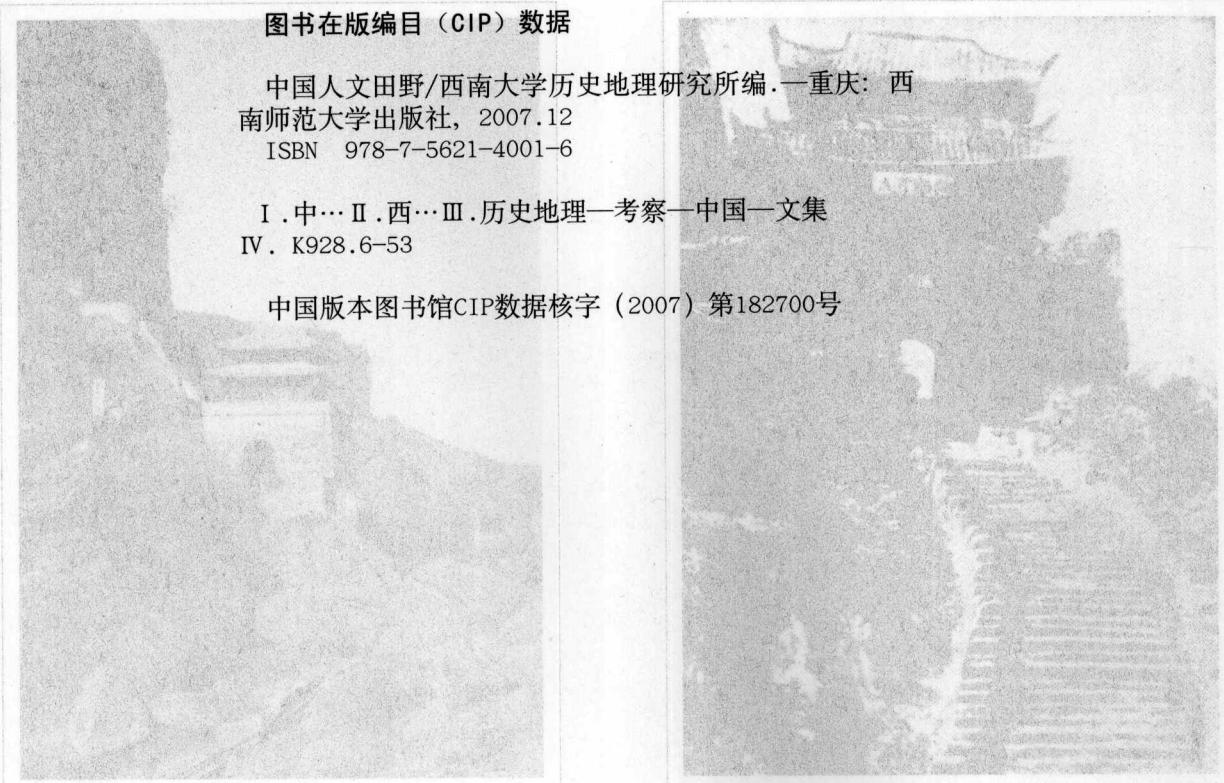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文田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621-4001-6

I . 中… II . 西… III . 历史地理—考察—中国—文集
IV . 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2700号



62图

52图

中 国 人 文 田 野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卢旭

特约编辑: 王文君 张利利 龚政

封面设计: 张宏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南大学校内

邮 编: 400715

网 址: <http://www.xscbs.com>

印 刷 者: 重庆康豪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378千字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4001-6

定 价: 40.00元

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中国人文田野》卷首语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不论是历史地理学者、人类学学者，还是考古学学者，探究人与自然互动常令他们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不能自抑。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撰《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的“究天人之际”实际上蕴藏着对漫长历史的天人关系的探索追求，而司马迁是将其放在第一位，可见司马迁的用心。从古到今，我们对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秘诀的追求，理所当然要将历史的轨迹放在承载历史岁月的空间中来讨论。现代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域，历史上的中国曾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域，在我们古人的交通条件下，进行这样的探索自然是充满着无数艰辛的。不过，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王士性的《广志绎》，我们的古人大多将“读”与“行”结合得很好，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古人何时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呢？看来至少在宋代就有人明确这样提了。一般认为是宋代刘彝《七经中义》中就提出，但刘彝《七经中义》170卷，早已经佚失，此话在何卷何章谈及，已无从考证。另一位宋人陈起《江湖小集》卷9中谈到，“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明显也有这种思想在里面了。在明代这种提法就较为普遍了，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唐志契《绘事微言》、杨慎《丹铅续录》中都有精彩的分析，清代钱泳更是专门谈起此事。

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兴起后，这种思想自然也成为这些学科最基本的专业要求。当然，我认为“读”与“行”的统一应该是所有人文学者都应遵循的道路。

其实我们的古人就感受到这一点。宋代陈起《江湖小集》卷9称“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实际上是说只有“行万里路”才能感受到杜诗的思想的深刻，这是做一个优秀诗人所需要的。此言做诗。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2：“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无望于庸史矣……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郢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此言绘画。杨慎《丹铅续录》卷4中记载他本人“过其地见盘江与崇敬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义”，发现了“牂柯”的异写错误后感叹：“然则读万卷书而不行万里路者亦不能识字也，信矣。”此言识字。

当然，我们的古人对此有时也思绪较乱。唐代杜甫《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说“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但宋人陈起称“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好像与杜甫自己的感受并不一样。看来，杜甫本人在自己的时代自己是无法感受到自己命运多舛、一生辗转流离，客观上是成就他诗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郑板桥从自己的感受发出“读书数万

卷，胸中无适主”的感慨，则与杜甫自己的感受完全相反了。可能从这一点上来看，郑板桥比杜甫的感受更多，思考更深刻了。别的不说，如果唐代的李白、杜甫等人没有多年在天南海北的游历和流离，仅是闭关于宫室人际间，可能纵然其读破百万卷书，显然不可能取得如此千古之名。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杜甫，其存留下来的诗歌中三分之一写于在三峡辗转寓居的日子，所以我们说三峡造就了半个杜甫。今天来看，唐宋大量文人千古绝唱都是写于辗转游历高山大川之中。所以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中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见老书生矻矻纸堆中数十年，而一出书房门，便不知东西南北者比比皆是。”这里钱泳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不能兼，显然是粗俗之见，但其感受到“行万里路”的重要性，是可取的。

从人类产生以来，地球下垫面的生物圈大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可以说人类的物质文化都是基于地理环境本身，而人类的精神文化也无不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所有人文科学都是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所以任何人文学者都应投身于社会实践和人化自然之中。不错，现代信息已经十分发达，不仅能在图书馆内放眼世界，连在家里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世界，在家里就可运筹帷幄，达到书生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这远非我们的古人能够相比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都存在有正反的影响。应该看到，越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走出书斋，超越网络，去寻找第一手材料，远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旷见闻、知世情的意义，更有提高人文科学的科学信度，增强人文科学的社会综合影响力的意义。

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科学积累丰厚，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也是日新月异，不论是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还是人类学，对田野考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中与现实关系最密切的一门学问，由于建设地理学的关怀现实的功能影响，加上地理学科对计算统计的要求，区位地缘、地形地貌、气候植被、人文景观、人文风物等无不需要人们实际考察的体验、感受和印证。如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如果仅依据历史文献的里程数在地图上按图索骥，直线定位，那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知道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对许多高山大川间的公路里程记载都还不够准确，所以怎么也不能对古代文献中的里程记载刻板信之。实际上我们古人的里程记载许多都是一种估算，有时以行走时间记程，有时用亭、铺、塘计算里程，地形地貌不同，相差明显。同时，不同时代里的实际长度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对于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如果没有实地田野考察来察山川形势，度长短起伏，显然是不行的。严耕望先生学养深厚，尽全史料功力厚绝，但其《唐代交通图考》由于没有田野考察支撑，往往时有不尽人意之处。古今人地沧桑变迁甚大，但中国历史文献中直接记载生态变化的史料十分零散，少之又少。我研究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多年了，但有时仍然在反问自己古今生态环境真的差异有如此之大吗？不过，不断的田野考察表明，我们自然环境在人化过程中的变化确实很大。在川西黄茅埂、皇木坪，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几百年前是一片片高大的冷杉林，后来人为活动影响使它产生巨变，自然景观完全判若两地。这种变化我们历史文献中难以发现，可能发现了也难以相信，但草甸中的孤树残木、当地口碑传说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典型的沧海之变，就在眼前，令您不可不信。三十多年前，我们的学者在研究历史时根本

没有历史生态环境意识。不过，到了现代人们环境意识浓厚之时，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生产力越发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明显，生态环境就越来越差，古代的生态环境就肯定比现在好。我们仅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更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简单结论。其实不然，人地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在人地互动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是复杂的。实际上通过我们的田野考察研究表明，至少清代中后期中国的城市四周的森林生态环境远比近20年我们的大中城市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古代有宝物鉴赏之类的学问，并没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今天的考古学从科学意义上讲是从西方来的。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以实地工作为重中之重，所以又称为“田野发掘”、“田野考古”，讲的话语是“探坑”、“遗址”、“文化层”之类。今天，我们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所谈的田野工作，可能在考古学来看，是最基本的了。至于人类学，不论是现代人类学，还是历史人类学，都是直接研究现实生活或历史上的人的学问，而且主要是分析区域差异中的人，这就赋予了人类学从开始就与田野调查密不可分的学科特性。

其实，“读万卷书”对于学者而言就如人要吃饭一样，是不需要强调的，这是对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基本要求。对于大众而言，“行万里路”表面上比“读万卷书”更容易，但对于学者而言，可能“读万卷书”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行万里路”可能就往往有难言之处。特别是在现代人文研究工程化、数量化的今天，花费大量财力、人力、时间做田野考察往往得不偿失，所以就是在今天，在许多人文学者中，仍然有不重视人文田野考察工作的现象。特别要指出的是，就是在我人文田野考察中，也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许多人只关注“大众景观”、“大众遗址”的考察，往往追求到此一游的效果，考察浮光掠影，流于形式。这种考察只满足研究领域最基本的感受和体验，故在其著作中完全没有直接的考察资料作为支撑，自然难有由此而来的创造性发现。

田野考察也应该与时俱进。正是因为科学积累深厚、信息发达，对我们的学者的田野考察要求就更高。现在民间的“驴友”徒步、自驾旅游、户外探险风尚一时，一大批本与地理无关的杂志也热捧跟风戴上“地理”帽子，“地理”一词在旅游业的推动下成为“显词”。这一方面为我们研究工作和田野工作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提供了我们更多的生存空间，但也造成了不少的压力，对我们的田野科学考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走前人没走路，发前人所未发，就显得尤为重要。记得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中称：“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然二者亦不可兼……然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里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亦比比皆是也。”在我看来，这里钱泳与其说是对“行万里路”而不“读万卷书”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当时一些一般意义的宦游、私游不深入的批评。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不仅是近代西方学者、日本学者在外田野调查的专业吃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我们仍然可从身边的国外人文学者身上感受到他们对田野调查的认真态度和吃苦精神。

其实我认为对于人文学者而言，田野考察远不仅仅是学科专业的需要，更是一个人文学者感受现实、关怀现实的一种途径。感受岁月沧桑，感受天人之际，寻求通古变今的秘

诀，这可能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动力所在。

同时，我同样认为，走向自然、走向田野，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更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一种途径。现实社会的红尘滚滚、利欲薰天，人世间的苦斗长征往往会使学者身心疲惫，有时不论您是性情中人，还是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人，躲也躲不了。不过，每当我们面对古人的斑斑遗址，发着思古之幽情，感叹古今沟通梗阻的困苦而沉迷于千古之谜时，这一切疲惫都会远离自己；同样，每当我们登临高山绝顶，鸟瞰群山如丸、长河落日，感受到自然博大、天地无边、人生苦短时，更会使潜在心中的俗念庸思灰飞烟散，将周边人际间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烦恼忘得干干净净，使脆弱心灵得到时时的安慰。当然，每当我们身处荒野孤寂，面对崎岖羊肠，感受古人的窘迫、苦难与今人的宽松、富足时，我们也会时时荣辱不惊、知足常乐而心境一片阳光。

不过，我们的学术界还没有一个专门为人文学者展示田野考察过程的学术刊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长期以来，不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今天我们几大领域的同行，已经做了大量田野考察工作，但是这些考察的过程往往缺失，被人忘记。但我们知道，对于科学研究而言，科学发现的过程有时远远比发现结果本身更重要。所以，将几大领域学者田野考察的过程展现给我们的同行和读者，这意义是十分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我们现代的学术文章往往都是一个个死面孔，清一色的文字，还限定在一万字以内，注释到了机械化的程度，许多时候往往形式决定内容，这是我们学术刊物的顽疾，更是学术研究的悲哀。所以，用一种图文并茂的形式，用通俗的语言将科学发现过程中的田野考察过程展示给大家是当务之急。通俗的话语、写实的照片、严肃的学术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我们人文学者们多年来的愿望。我们充满期待！

清代初年魏禧（叔子）曾谈到学者的一生要读书20年，著书20年，出游20年，才能不至于愧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我看来，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博士，正常也需要22年之久，加上著书时还边读边著，读20年书看来不成问题。三十而立开始著书，著书到70岁，著书20年也不成问题。但可能要我们出游20年，即做田野工作的时间累计到20年，可能就困难了。我们还需努力！

《中国人文田野》将载着这种期待，助您我努力再努力。



蓝勇

2007.7.10

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中国人文田野》卷首语 蓝 勇 (1)

田野学者风采



弘扬师道 永怀师恩

——记与史念海先生的六次历史地理野外实地考察 李健超 (1)

我与羌族研究 李绍明口述 王林录音整理 (11)

探索沙漠之路

——记沙漠考古学家、生态环境学家景爱的田野考察 苗天娥 (20)

田野考察纪实



晒经石的历史考察与南方丝绸之路 蓝 勇 (49)

寻找瘴气之路 (上) 周 琼 (63)

渭河上游五日考察记 王晓霞 (120)

云南明代小脚移民部落考察记 龚 政 (147)

田野学术论坛

浙闽开发与泰顺地域文化

——兼论浙南、福建文化的共同性 吴松弟 (169)

唐代嵩州西泸县治考察 朱圣钟 (189)

“大同婆娘”的寻访与思考 白昌红 (198)

田野旧影识读

三张剑门关照片反映的历史 梁 州 (208)



弘扬师道 永怀师恩

——记与史念海先生的六次历史地理野外实地考察

李健超



作者简介



李健超教授，1933年10月生，河南洛阳人。1957年西北大学地理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为地理系、历史系、中文系的本科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学等课程。在科学方面，1959年至1960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西部地区南水北调队，对中国西南横断山区的西昌、木里、中甸（香格里拉）、丽江、维西、大理、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县进行历史、民族、社会调查。1972年至1975年从事陕西军事地理研究，随同史念海师等对陕西大多数市、县及陕西毗邻的甘肃、宁夏、内蒙、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1980年，只身对天山南北及新疆边陲地区进行实地考察。1990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参加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沙漠路线的全过程考察。专著有《陕西地理》、《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等。1994年退休后，仍参加有关历史地理学的科研工作。

岁月流逝，时过境迁。几十年前的许多往事都已印象模糊了，唯独史先生的教诲与提携记忆犹新，如在眼前。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1



1957年夏季，我在西北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师承王成组教授从事地理学史和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的研究。为拓宽学术研究视野，经领导批准，每周两次从西北大学骑自行车到西安师范学院聆听史先生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当时是随该院历史系四年级毕业班，听课的还有几位年轻校外助教，每次课前都要发上几张蜡纸刻印的讲义，从此我就成为史先生的一名旁听生，时间近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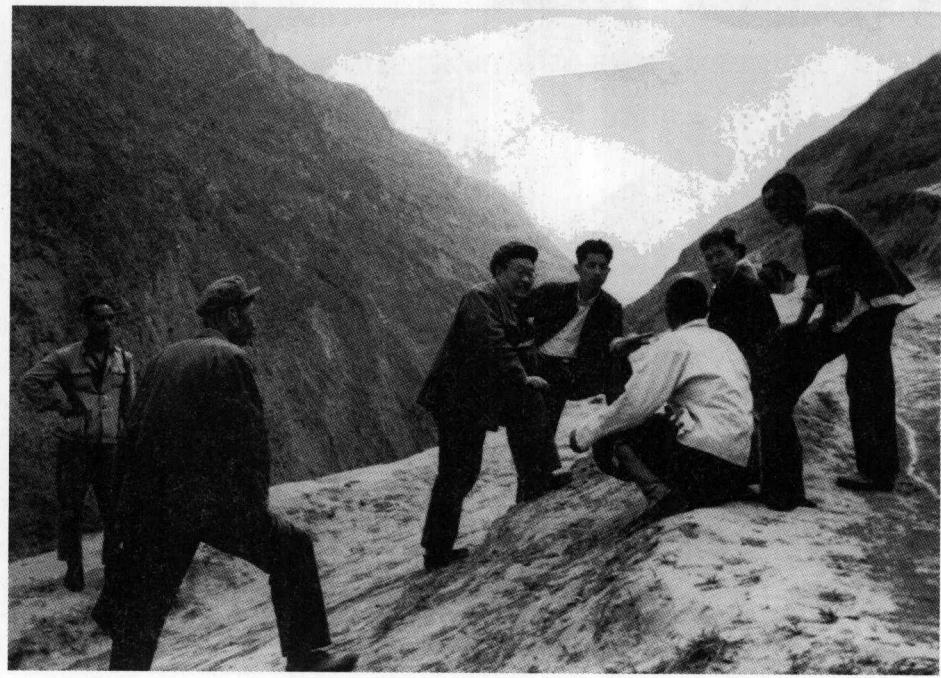
不言而喻，1957年前后的“反右”、“大跃进”以及后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几乎与史先生很少往来。直到1971年12月，我由西北大学暂时借调陕西省军区，调查研究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才有机遇与史先生朝夕相处。

初来乍到，我对陕西历史军事地理的认识非但是模糊，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既滥竽其间，就跟随史先生查阅陕西地方志和史书记载，逐渐对陕西历代发生的战争有了初步认识，但那只是“空中楼阁”。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便有几次实地考察。

1972年4月16日至26日，我与史先生一行7人，首次进行陕西军事历史地理野外实地考察，重点是考察古代陕西东通中原的军事信道与关隘。路线是由西安东北行到韩城，渡过黄河龙门，经河津县、侯马市，南下潼关。再由潼关东出秦汉函谷关至洛阳，再南穿熊耳、伏牛两山下南阳，走西峡，经武关归来。这次考察虽然只有短短10天，但却有很大的收获。如果不到潼关实地考察，就不可能详细了解历史上汉潼关、隋唐潼关、今潼关的地理形势与关防之重要意义，也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仅有1万军队的曹操居然能巧妙利用潼关地理条件，打败十倍于自身的马超、韩遂的10万联军而取得胜利。战国时秦设立的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汉武帝时迁函谷关于今河南新安县城东，称函谷新关。通常认为迁移函谷关的原因是楼船将军杨仆耻为关东人，故而移关于杨仆的家乡宜阳之东，实则是因为西汉与战国时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所致。直到20世纪90年代河南黄河小浪底水库兴建时于黄河岸畔出土大量“函”关瓦当，才更进一步认识到迁移函谷关的原因是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至于函谷关、潼关侧翼的武关道，由于武关的地理历史多有变迁，那次没有仔细研究。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2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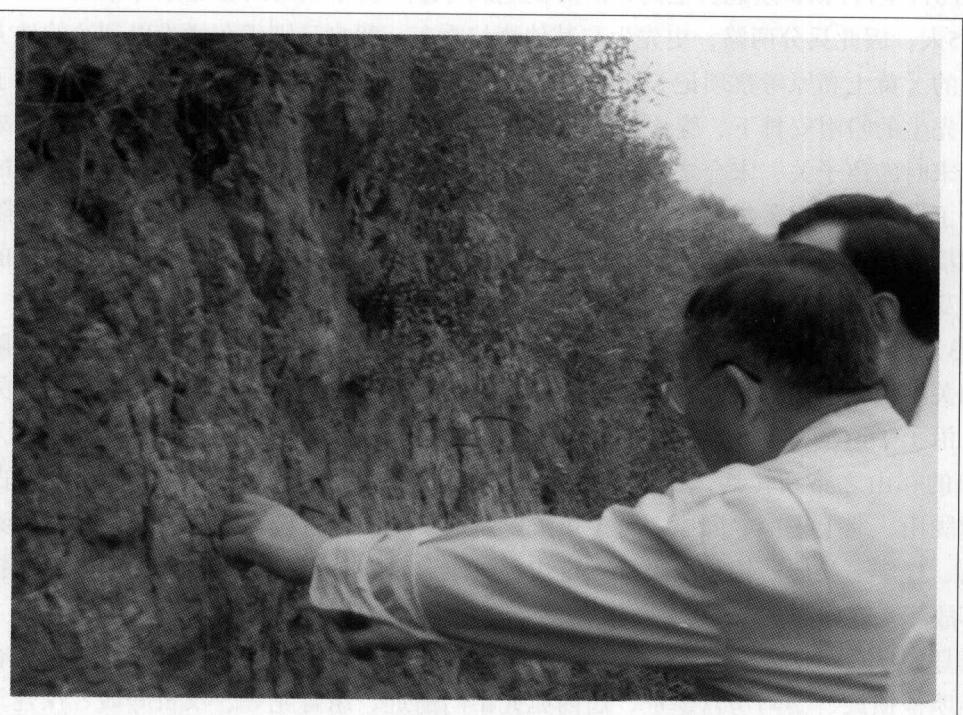
同年6月8日至7月14日陕北黄土高原的历史地理考察，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一辆军用吉普车只能乘坐5人，因此兵分两路，史先生与其他诸位乘车，我自己则于车辆难以到达的地方去补察。史先生在他的《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一文中已记述了这次考察的详情，而我这次却扮演了一名散兵游勇，在史先生的吩咐安排下，穿梭于延安、榆林及内蒙间的沟壑，对车辆难以到达的战国时代的雕阴城、唐宋时的芦子关、宋金之战时的禅梯岭（雁门关）以及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出生地柳树涧堡进行了考察。我把采集到的新闻和实地考察到的实况都告诉史先生，他在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初稿时，以我实地考察的靖边县杨桥畔附近古城遗址、安塞县与靖边县交界处的芦子关的水土流失以及柳树涧堡黄土沟壑溯源侵蚀穿过长城的事例来说明古今地理变迁。

1973年3月15日至4月8日第三次与史先生在陕、川、甘、宁四省区考察，目的是考察陕西南部的攻守形势和关中历代南面的关隘，包括秦汉时期的陇关、萧关，宋金之战时的仙人关。先由西安出发越秦岭，沿子午道至石泉，再溯江而上至汉中，考察宁强县之百牢关、甘肃徽县之仙人关，沿诸葛亮所出的祁山之路到礼县，复越秦岭到天水，由天水至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陇城镇古城寻找街亭，又东越陇山，北上平凉、固原，考察萧关、朝那（今固原古城，宋时为东山寨）、秦县城，又东北至环县，经宁夏吴忠、银川、灵武、定边、吴旗、延安、富县、黄陵返回西安。原拟考察秦直道，因汽车故障未能如愿。

同年11月19日至23日，随史先生先后实地考察西安近郊的历史战地和历史遗迹，有香积寺、斗门镇、汉昆明池遗址、秦阿房宫遗址、唐内苑光泰门遗址、唐青龙寺、汉长安城、汉建章宫等。在汉建章宫遗址（现在的伍堡子村）内，公社农民种菜，地下翻出大量汉代宫殿区的非常完整的花砖、花纹砖和带云纹、有文字的汉瓦当，散乱在地面，俯拾皆是。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4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5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6



1974年1月11日与史先生同车实地考察秦咸阳城遗址、唐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秦汉栎阳城遗址。元月22日为阴历癸丑年除夕，我由陕西省军区回到西北大学。史先生一人留军区继续从事《陝西军事历史地理》的编著。

1975年2月21日至29日第六次与史先生同车出行，考察秦直道及陇东黄土高原上的古城寨以及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现状。由淳化县的秦汉林光宫（甘泉宫）遗址北上子午岭，沿秦直道遗址北行，林海茫茫然而亦有盘旋曲折，岭脊宽平，今仍为林区车道。随后经甘肃正宁、宁县、庆阳，到董志塬，现场考察汉彭阳城、唐彭原古城。这次考察后，史先生撰写《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先后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和《文物》1975年第10期。有趣的是那年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十年，不要说“抓革命”未能“促生产”，可以说到处是“饥馑遍野”，究竟有几个人能吃上一顿饱饭？同车进行野外考察的除史先生和我外，还有一位稍小于我的学者。当我们来到宝鸡市一军事单位用饭时，按当时军队伙食标准是每人交纳全国通用粮票四两，人民币二角钱。但喜出望外的是一大盆油煎鸡蛋、两笼白面蒸馍端上来了，我们三人均将其一扫而空。粗略估计，一盆炒蛋至少有20多个鸡蛋，馍馍也在7斤以上。不由得我们三人相顾大笑，“真是饭桶”。一位年已花甲的老教授和两名年过“不惑”的大学助教，竟如此“大肚”，至今回忆起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这确实是事实，是一个特写的历史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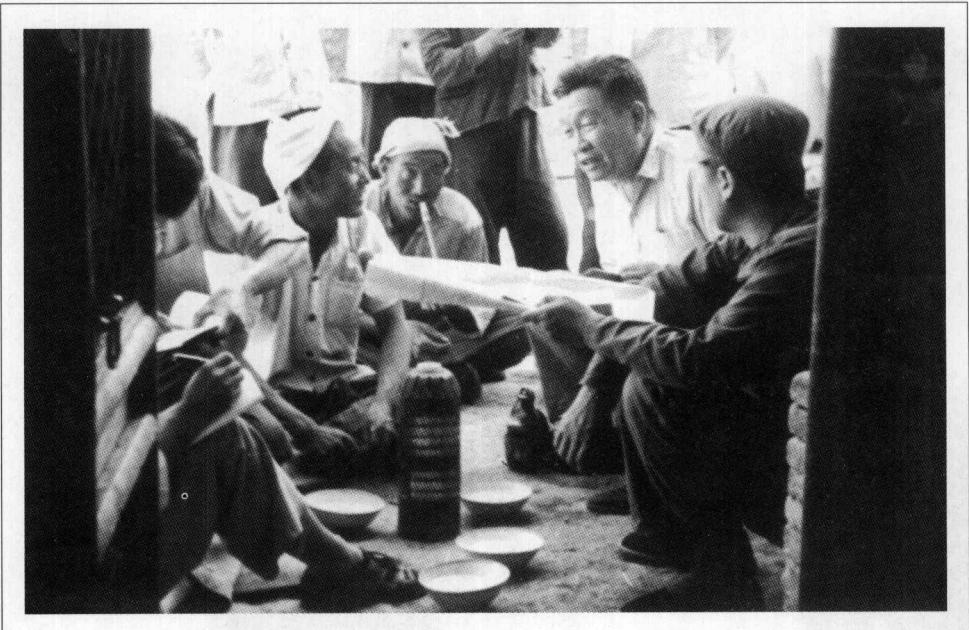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8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9

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前后六次和史先生同行同宿，实地考察，耳濡目染，感受至深：第一，他的求真务实精神。在野外考察时，他已是一名饱学宿儒，知识渊博，然而不放过一个难点，探个究竟。宋金之战时的仙人关，久已不闻。先生实地考察终于在荒山漫草中寻找到关址并挖掘到仙人关遗址中的碑石。关于诸葛亮伐魏，六出祁山（实为二出祁山），祁山在哪里？为什么他不从汉中径直北上五丈原而要绕道西汉水所出的祁山呢？通过沿当年孔明的出师路线，在甘肃礼县考察祁山之后，揭开了这个历史之谜。至于宋夏永乐城之战，一仗死了10多万人，但方志记述的永乐城仅是黄土沟壑区的一个弹丸之地，实地考察在无定河谷找到了永乐城。关于此，史先生在《河山集》中曾有说明，此不赘述。这正如元好问诗中所说：“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只有实地考察求真务实才能求得真知。第二，平易近人，不耻下问。大凡古代有成就的学者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家，多能“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究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叙）尤其对于研究军事历史地理的人员来说，不能实地考察险要，辨别攻守，怎么能周知天下之故呢？山川城郭津梁时有变迁，有些踪迹难寻，因此必须访问调查。每到一地史先生总是不辞劳苦，向各阶层知情者询问，务必求得实情。第三，他立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高瞻远瞩，举一反三。不仅圆满地完成《陕西军事历史地理》的专著，而且独有心得，写下了数十万字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的鸿文巨著，拓宽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10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11

史先生的慈祥谦和、平易近人、衣履朴素，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即使在紧张的考察中也不时地给我们讲些笑话故事。考察中有时也遇到有惊无险的事。一次当我们一行登上黄河龙门的铁索桥时，正值傍晚，风急，铁索桥悬空摆动，每行一步犹如幕布上踩空，扣人心弦，史先生紧紧地和我抱在一起，等由陕西到达山西彼岸，我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相形之下，我随同史先生一起野外考察，为什么在此期间没有只言片语的文字发表呢？可叹自己初出茅庐，字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受益，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情，既不能也不敢动笔舞墨。如果说尔后我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资料员能忝列于历史地理学领域，是与史先生的面授耳提分不开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偶有所得撰写些短文请他批改，他都细心一字一句的批注。有一次他对我说：写文章既要开门见山，也要含蓄，不能一枪刺死杨六郎啊！他给我的批示至今仍在珍藏。

史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难忘的教诲，由衷的感谢，这种师生之谊不以时光流逝而淡薄，也不以环境改变而改变。忆往昔野外考察，闭目沉思，浮想翩翩，仿佛仍与先生神游万里，忽而奔驰在荒山野岭，穿林涉水；忽而步行于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待张目而视，则人去室空，悲夫！固然我也常常萦念写点儿回忆和纪念先生的文章，但自愧忝列门墙，又拙于文笔，如有不妥，恐有辱尊师，故而迟迟不敢下笔。今仅记与史先生的六次野外考察，以永怀师恩。

史念海先生田野考察掠影12

